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

吕学明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

吕学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对象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在全面收集铜刀资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考古类型学理论，进行类型式划分，探讨铜刀的演变及发展规律。总结出先秦铜刀的发展历经了夏代前后、商代中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铜刀的区域特征及区域间的互动过程。本书将铜刀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我国冶铜术的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总结出铜刀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并将漫长的、动态的铜刀发展演变过程概括为八个阶段。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铜刀起源中心，在与境外的不同时代的诸多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本书适合从事历史学、考古学特别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 / 吕学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3-028283-5

Ⅰ.①中… Ⅱ.①吕… Ⅲ.①青铜器（考古）－兵器（考古）－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Ⅳ.①K87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371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曹明明 / 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3/4 插页：1

印数：1—1 500 字数：320 000

定价：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夏代前后铜刀研究 …… (13)
第一节　种类与型式 …… (13)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 (25)
第三节　分区研究 …… (29)
第四节　发展与演变 …… (31)
第三章　商代中晚期铜刀研究 …… (35)
第一节　种类与型式 …… (35)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 (75)
第三节　分区研究 …… (87)
第四节　发展与演变 …… (90)
第四章　西周至春秋早期铜刀研究 …… (95)
第一节　种类与型式 …… (95)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 (133)
第三节　分区研究 …… (147)
第四节　发展与演变 …… (157)
第五章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铜刀研究 …… (163)
第一节　种类与型式 …… (163)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 (201)
第三节　分区研究 …… (215)
第四节　发展与演变 …… (217)
第六章　相关问题的综合考察 …… (222)
第一节　铜刀的功能 …… (222)
第二节　铜刀的起源 …… (236)
第三节　铜刀的演变过程 …… (248)
第四节　与境外诸考古学文化铜刀的关系 …… (253)
第七章　结语 …… (261)

第一章　绪　　论

1. 研究对象与目的

本书论及的铜刀是指条形的边刃刀，包括连柄浑铸的刀子、复合柄刀子和需装木柲的有内、穿或管銎的长体刀，不包括骨梗铜刃刀和端刃刻刀。研究的时间范围，包括了以齐家文化早期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末期及夏商周三代。采用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始年，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之分界，公元前1046年作为商周之分界[①]，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春秋与战国之分界。空间范围覆盖了我国秦岭—淮河以北，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广大地区，这一区域可统称中国北方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湖北黄陂盘龙城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已超出本书讨论的空间范围，但是由于学术界公认盘龙城属于商王朝控制的重镇，其代表的文化内容属于典型的商文化，因此为了保持文化内涵的完整性，对盘龙城出土的铜刀也进行了研究。

本书所采用的材料以2009年7月以前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为主。收集和传世的铜刀虽然数量巨大、类型丰富，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出土地点、层位关系和共存器物，本书仅将其作辅助性旁证。在引用材料时，重点选择出土铜刀线图或照片清晰、尺寸明确、伴出器物时代特征较明确的典型单位。仅对形态完整的铜刀进行类型学研究，形态残缺的铜刀作为参考材料。部分简报和报告中公布的铜刀资料缺乏翔实的文字或图片信息，这为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本书运用考古类型学原理，对铜刀进行类型式划分，探讨铜刀的演变及发展规律。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铜刀的区域特征及区域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探索这类器物本身所蕴涵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影响。

青铜刀多属小型青铜器，其类型极为丰富、特色非常鲜明，承载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区域特征。青铜刀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代表器类，成为多种文化因素的载体。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青铜刀的研究，了解其类型、演变、分布、用途、工艺特征等，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其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 研究历史与现状

关于青铜刀研究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20 世纪 30 ~ 40 年代

在这一阶段，青铜刀作为小型的工具和武器，较少受到国内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倒是国外学者最先对其进行了介绍、分类和初步研究。这些铜刀均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的藏品，其主要来源为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

1932 年，安特生（J. G. Andersson）发表了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一文[①]。文章的前半部分介绍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所收藏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其中馆藏铜刀总数为 259 件，文章介绍了 29 件，但其中有 1 件应为铃首短剑（参见原书 Pl. V，3）。

1933 年，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举办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展，安特生选择有代表性的器物进行了介绍[②]。其中有 3 件铜刀，包括 1 件程式化的兽首刀、1 件鸟首刀和 1 件首端连缀人面的铜刀。

1933 年，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在《卢芹斋藏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一书中，对巴黎古董商人卢芹斋收藏的出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进行了专门研究[③]。其中有 18 件铜刀，作者认为这些铜刀受到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影响。

1935 年，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在《内蒙古· 长城地带》之绥远青铜器部分发表了 61 件铜刀，并将这些铜刀分成 11 型[④]。

1940 年，梅原末治在《河南安阳遗宝》[⑤] 一书中，以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对日本、美国、瑞典等国的博物馆、大学及私人收藏的传出安阳的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将铜刀归为利器类，认为安阳出土的铜刀与北方半游牧民族使用的铜刀相似，并重点讨论了所谓“异型利器”（实为需要装木柲的长体卷锋刀）。书中发表了 7 件铜刀，其中复合柄刀 4 件、长体卷锋刀 3 件。

---

① J. G. Andersson.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2, No. 04.

② J. G. Andersson.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3, No. 05.

③ Alfred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④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 长城地带》，东亚考古学会，1935 年。

⑤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京都小林写真制版印刷所，1940 年。

1945 年，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发表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①]，对博物馆、古董商人和收藏家收藏的据传出土于安阳的一些武器和工具进行了分类研究。文章主要依据柄首的不同，将铜刀分成四类。第一类包括短直柄无首刀、2 件龙形柄刀和 1 件长体卷锋大刀，第二类是环首刀，第三类是铃首刀，第四类是兽头首刀。

这一阶段，铜刀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在介绍资料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简单分析和比较研究。

（2）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

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国内学者开始用科学的眼光对待诸如铜刀这类小型的不惹人注目的出土文物。尤其是通过对殷墟的大规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铜刀资料，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始关注这类器物，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奠定了今后深入研究的基础。

1949 年，李济对殷墟出土的铜刀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铜刀的类型、演变序列、铸造方法和用途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兽头刀的产生进行了专门的论证[②]。依据形态上的演变，李济将殷墟出土的铜刀分成三大组。第一组：凸背凹刃；第二组：凹背凸刃；第三组：近于直背的凸刃。除此三大组外，还有一些铜刀形态特征介于三组中间，均归入混合组。李济认为殷墟铜刀源于石器时代的蚌器、石器及骨梗石刃工具，具有由简到繁、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过程。其铸造方法经历了一面平法、合范法和内模法三个阶段，并认为每一个阶段的开始同时也就是新形制产生的机会。李济还从形制与结构、冶金的技术和纹饰的母题三个方面论述了兽头刀在商代的出现并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长期的孕育历史。李济认为大型的兽头刀是短兵相接时作战的兵器，是剑的前身。李济《说刀削》一章是青铜刀研究的奠基之作，第一次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铜刀进行了深入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可称经典。

1954 年，陈梦家在李济《说刀削》一章的基础上，对安阳出土铜刀进行了更为深入一步的研究[③]。首先对铜刀各部位的名称进行了说明和定义。然后将铜刀分成甲类：拱弧形背，凹刃；乙类：曲弧形背，凸刃；丙类：锋扬拊抑，凹刃；丁类：保持舌柄，与刀体近柄处成直线，共四大类。同时，依据刀柄和柄端的变化，将各大类铜刀又分成若干亚型。文章还根据各类铜刀形态上的不同，论

① Bernhard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5, No. 17.

②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 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 年。

③ 陈梦家：《殷代铜器三篇》，《中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 年。

证了各自的功用，并指出环头刀、兽头刀并不是近身搏斗的短兵，而是附属于兵器的工具刀。文章指出了李济对铜刀铸造方法认识的不确切之处，将殷墟出土铜刀的铸造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单范法；中期：对范法；晚期：精致对范法。文章重点论述了刀柄和柄端的演变，将刀柄分成五大类，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总结了各阶段的特点。陈梦家将刀柄和柄端的变化、演进作为讨论的重点，敏锐地抓住了铜刀最具特色的关键点。

1967 年，高去寻发表《刀斧葬中的铜刀》[①] 一文，对安阳侯家庄西北岗 80 座“刀斧葬”中出土的 700 余件铜刀进行了系统分类研究。按照刀背的形式、刀踵的分别和柄首的差异，将“刀斧葬”中出土的铜刀划分成五大类 49 种。此外还统计了纹饰种类、铸造方法和尺寸重量。文中最后指出，李济关于小屯出土铜刀的演变方向与过程仍然是可信赖的。

在这一阶段，国外学者罗越（Max Loehr）对中国的铜刀有较深入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罗越对德国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收藏的 100 多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包括 11 件铜刀。该研究成果于 1956 年以《中国铜器时代古兵——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eking*）为名出版[②]。1951 年，他发表了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New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Second Part*: *Knives*[③]。文章最大的特点是依据纹饰对铜刀进行分类，不同于其他学者依据刀身的形态或柄首的变化进行分类。作者根据铜刀装饰纹饰的不同，将大约 90 件出于鄂尔多斯的青铜刀划分成 20 组，详细描述了各组装饰纹饰的特点。文章还分析了各组纹饰的年代，建立了年代序列。

1972 年，林巳奈夫在《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④] 一书中，将商周时期的铜刀划分为内弯刀、小刀和长刀三大类。结合实例讨论了铜刀的时代特征和功能，考证了文献中记载的鸾刀和削，并推定长刀主要是仪仗用器。

在这一阶段，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基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资料，开始对铜刀进行系统性研究。考订了铜刀的各部位名称，提出了类型划分标准，推定了铜刀演变规律和过程，探讨了铸造方法和功用。这些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① 高去寻：《刀斧葬中的铜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 上册，台北，1967 年。

② 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ek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③ Max Loehr.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New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Second Part: Knives. *Artibus Asiae*, 1951, Vol. 14, No. 1/2.

④ 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京都大学，1972 年。

（3）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有关铜刀的资料迅速增加，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众多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也自然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1981 年，田广金对鄂尔多斯收集的百余件铜刀进行了研究[①]。根据刀柄的变化，将铜刀分为两大类：A 类，刀柄扁平，横截面多为椭圆形；B 类，刀柄两侧起凸棱，中间凹入，有的有多道凸棱。根据柄首的演变，将两类铜刀又各分七式。文章将鄂尔多斯铜刀的演变发展分成四期，从早商一直延续到战国。田广金是国内学者中第一个采用刀柄和柄首的变化作为铜刀分类依据的，但其类型的划分过于粗糙。文章认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文化，很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附近地区，并且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1983 年，佟柱臣在《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②]一文中指出，商周时期铜刀形式富于变化，是当时广泛使用的工具。依据刀体的变化，将商代铜刀分成 8 式，将西周铜刀分成 5 式。文章认为西周铜刀与商代铜刀的不同处在于，西周铜刀的柄首多为长方形孔，而商代的多为圆孔。

1985 年，陈振中对全国 24 个省市发掘出土的战国以前的铜刀和被认定为这一时期的传世品进行了梳理，考察了 19 个省市 82 家收藏单位，在此基础上对铜刀进行了分类，推考了铜刀的功用[③]。根据刀柄的变化，将铜刀分为 11 大类，每类铜刀都列举了典型标本，言明了分布区域。比照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刀具，结合古文字中与刀字有关的形象、古文献中有关铜刀的记载和铜刀出土时周围的情况，推测了各类铜刀的功用。这是第一篇对全国范围内先秦时代铜刀进行研究的文章。2004 年，陈振中在其编著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④] 一书中，按刀柄形态的不同，将边刃刀划分为 12 型。最重要的是，该书不但详尽收录了全国 1991 年底之前发表的铜刀资料，而且还收录了作者在各地考察时所获得的资料，同时配有照片和线图，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1988 年，李维明对商代铜刀进行了分型、分期研究，探讨了铜刀的用途[⑤]。根据柄首的变化，将商代铜刀划分成 10 种类型，并首次将长体大刀和端刃刻刀也包括进来。文章认为商代铜刀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大阶段：早

① 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和铜刀》，《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印，1981 年。

② 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③ 陈振中：《我国古代的青铜削刀》，《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4 期。

④ 陈振中编著：《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⑤ 李维明：《简论商代青铜刀》，《中原文物》1988 年第 2 期。

期造型简单，刀体较小，铜刀数量少，分布集中；晚期类型较多，工艺复杂，出现了大型刀，数量大增，分布地域广大。在讨论铜刀的用途时，认为大型刀是将领使用的兵器或礼器，中型刀是下级军官和军士所执的短兵刃，小型刀是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工具。

1991 年，瑜琼对齿柄铜刀进行了系统研究[①]。文章指出，齿柄铜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吉长地区，特点鲜明，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文章将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及沈阳地区作为一区，将该区内发现的齿柄铜刀划分为 3 型 9 式。将吉长地区作为二区，将该区内发现的齿柄铜刀划分成 2 型 5 式。文章对每一型式铜刀的演变规律和出现年代进行了推论，认为齿柄铜刀约产生于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繁荣发展期，战国时期数量较少，逐渐衰落。一区是齿柄铜刀发展的中心区域，二区齿柄铜刀的出现年代较晚。

1993 年，刘一曼对殷墟铜刀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理、分类，对铜刀进行了分期，分析了各类铜刀的用途，探讨了殷墟铜刀的源流[②]。文章依据刀柄、刀首的特征为分类标准，将 130 余件考古发掘出土铜刀划分为九大类，每类中再根据刀身的形态进行分型分式。文章将殷墟铜刀分成早、中、晚三期，讨论了各期铜刀的形式及演变规律，并将三凸纽环首刀出现的时间从殷墟晚期提前到早期。对各类铜刀的用途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论证，归纳为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武器和礼器四种用途。文章最后探讨了殷墟各类型铜刀的渊源。

1994 年，郑绍宗对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铜刀进行了分类和分期研究[③]。文章将 61 件铜刀标本划分成凸背直刃式、凸背凹刃式、直背直刃式和凸背曲刃式四大类。同时将这些铜刀分成六期：第一期，商代后期；第二期，西周早期；第三期，西周中期；第四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五期，春秋中晚期；第六期，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文章最后讨论了北方式铜刀与中原商周铜刀和卡拉苏克式铜刀（郑文称为克拉索克式）的异同及相互影响，长城地带古代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1995 年，朱凤瀚在其巨著《古代中国青铜器》[④] 中将铜刀划分成武器和工具两大类，并认为刀片是刀的最重要的应用部分，其形制决定于刀的用途，自然也昭示不同的形制渊源。据此将作为武器的刀划分为 4 型，将作为工具的刀和削划分为 6 型。

---

① 瑜琼：《齿柄式铜刀刍议》，《北方文物》1991 年第 3 期。

② 刘一曼：《殷墟青铜刀》，《考古》1993 年第 2 期。

③ 郑绍宗：《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刀子及其有关问题》，《文物春秋》1994 年第 4 期。

④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004 年，李刚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①] 中对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刀进行了论述。文章将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刀分成甲乙两类，甲类为复合柄刀，乙类为连柄刀，两类之下又各自包含若干型和亚型。文章认为甲类刀的出现早于乙类刀，其出现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 3000 年。乙类刀的出现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公元前 2 千纪后半是乙类刀大发展时期。乙类刀出现后并未完全取代甲类刀，二者有着相当长的并行发展时期。文章认为包括甲类铜刀在内的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的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伊朗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而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乙类铜刀可能受到卡拉苏克文化、鹿石文化和塞伊马文化的影响。

2006 年，高西省对商周长体卷锋大刀的分布、年代、演变及相互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②]。他认为这种大刀主要分布在陕北—晋西北地区、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虽然出土数量有限，但区域特征鲜明。陕北—晋西北地区长体刀以銎置柲，多无锋，刀体上有一排乳钉；关中地区长体刀以穿固柲，刀锋微卷，刀体窄长；中原地区长体刀以銎置柲或以穿固柲，均有卷锋，刀体宽大。文章认为长体大刀最早出现于陕北—晋西北地区，年代上可早到殷墟二期，这里是此类刀的起源地。在陕北—晋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长体大刀均伴随大量青铜礼器出土，显而易见，其不仅是武器，也是一种礼器，是身份的象征。但在关中地区，情况却相反，长体大刀往往出于低等级的贵族墓葬，伴出的青铜礼器很少。

2006 年，陈亮对周原遗址历年来出土的铜刀进行了统计分析，划分了类型，探讨了铜刀的用途[③]。以铜刀柄首的异同，将周原遗址出土的 90 余件铜刀划分为五个类型，分别是无首刀、实首刀、圆环首刀、方环首刀和异形首刀。每个类型又可依据刀身形状的不同，划分出不同式别。绝大部分无首刀和部分实首刀采用单范铸造，其他类型铜刀基本上都是用双合范法铸造。根据周原遗址铜刀分布范围相对集中，主要出于制骨、冶铜等作坊遗址，确认这些铜刀是重要的制骨、冶铜工具。

2008 年，韩金秋对商周长体刀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讨论了长体刀的年代和地域差别，对各型长体刀的起源进行了论证和推测[④]。将长体刀划分为 A、B、C 三型，A 型刀锋卷勾，B 型刀锋上翘，C 型无锋。A 型刀集中发现于中原文化范

---

①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 年。

② 高西省：《商周长体刀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3 年第 6 期。

③ 陈亮：《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削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3 年第 6 期。

④ 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见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 2 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围内，是中原文化的器物，流行于早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其源头是夏代及至新石器时代的多孔石（玉）刀。B 型刀集中出于陕西关中地区，是黑豆嘴类型的典型器物，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其产生受到了 A 型刀的影响。C 型刀集中出于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是石楼类型的典型器物，流行于商代中晚期，其产生受到了中原文化和西亚文化的共同影响。

这一时期对铜刀的研究更具体和深入，不但有宏观的总括性的研究，更有细致的区域性研究以及对单类铜刀的研究。关于铜刀的起源、流布及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也有涉及。

综上所述，先秦青铜刀的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很多学者对青铜刀进行了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但由于这类器物的形态多样，分类标准本不易把握，加之对类型学原理理解的程度差异等因素，导致多数的研究对铜刀的分类都有不尽合理之处。而且，有不少种类的铜刀的演化规律还未能厘清。因此，有必要继续遴选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类型学研究标准，对铜刀的分类与排序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二，对青铜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区域和某一个类型方面，而就整个先秦时期青铜刀的类型学研究和编年序列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注重个体研究，缺少整体考察，不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其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

第三，关于青铜刀的起源、流布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交流问题，虽然有多种观点，但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对铜刀功能也有深究的必要。

3. 铜刀各部位名称图说

关于铜刀各部位的称谓，陈梦家曾做过定名定义[①]。本书在陈文基础上，综合各家意见，结合图解，对铜刀各部位的名称逐一进行说明和界定（图 1-1）。

刀身：刀刃与刀背之间的主体，是铜刀的主要部分。为适应不同的使用功能，刀身部分有较多变化。

刀柄：与刀身相连接的把握部分。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刀柄与刀身连体浑铸，可以直接把握；第二类是复合刀柄，与刀身直接相连的是短薄的柄舌，需要加装木、骨等质料的柄；第三类是长木柄。《礼记· 少仪》：“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云：“颖环也，拊谓把”，孔颖达疏云：“颖谓刀环也。”刀环是柄首的一种形式，可称之为环首。对于刀柄与刀身连铸的铜刀而言，柄首是铜刀变化最为丰富的部位，蕴涵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区域特征。

刀锋：刀刃的最前端是刀锋。

---

① 陈梦家：《殷代铜器三篇》，《中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 年。

阑：刀身与刀柄交界处，有的有向下突起的部分，称为阑。

限：刀身与刀柄因厚度不同，在交接处显示界限者，称为限。

銎：刀背上的管状筒，多为三个并列，以木柲贯入銎孔，可以固定铜刀。

内：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刀背上的窄条状脊，另一种为长条片状。内嵌入木柲，使刀身与柲结合固定。内上常见的孔叫做穿，用以穿绳缠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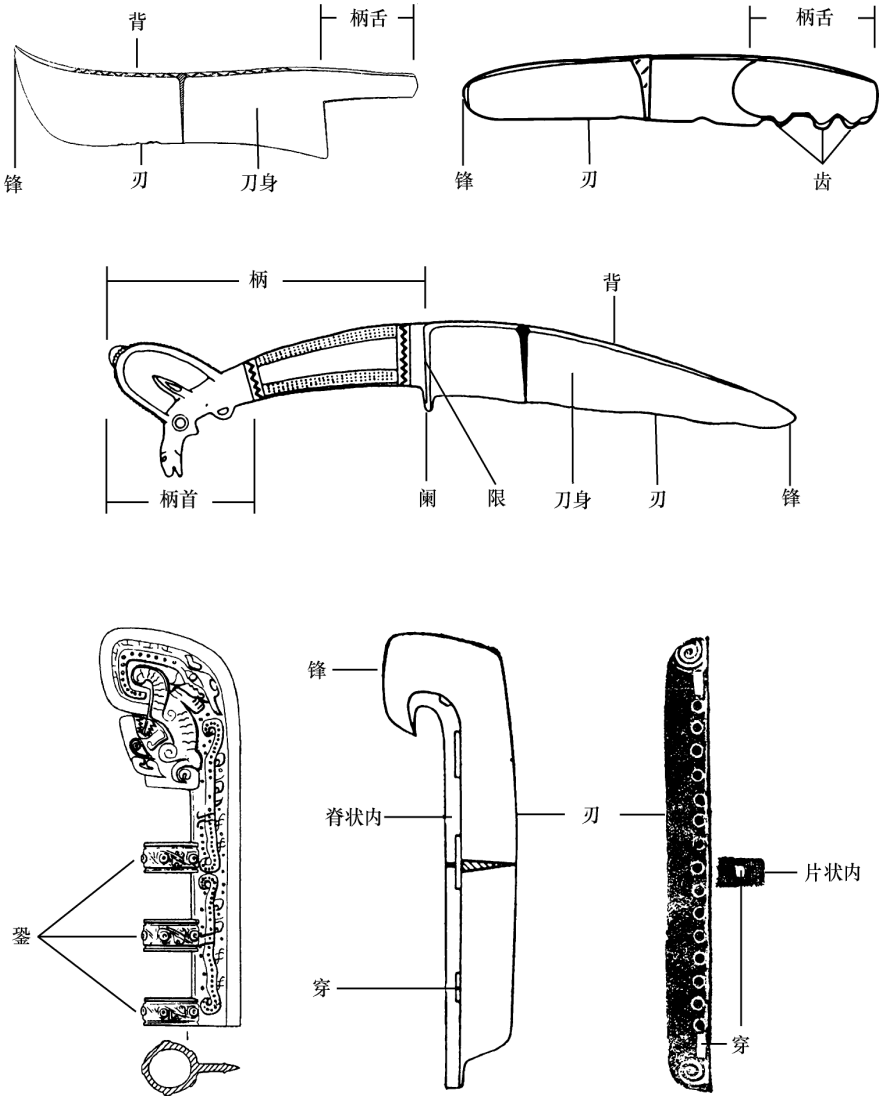

图 1-1 铜刀各部位名称

柲：即长木柄，一般截面作圆形。

鞘：套在铜刀上的附件，用以保护锋刃。《诗经· 大雅· 公刘》：“维玉及瑶，鞞琫容刀。”鞞就是刀鞘。考古发现有木质、皮质、漆制、铜质和铁质刀鞘（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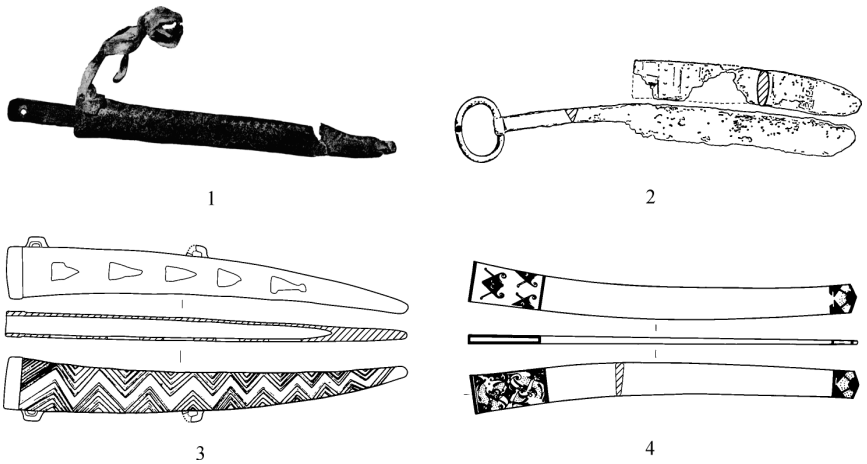

图 1-2　刀鞘

1. 皮鞘（哈密市五堡古墓）　2. 铁鞘（长子县 M7∶56）　3. 铜鞘（宁城县小黑石沟 M8501∶102）
4. 漆鞘（江陵县望山沙冢 WM1∶G17）

4. 铜刀的分类标准

青铜刀的形制复杂多样，时代与区域特征十分鲜明。要理清它们的演化轨迹和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对其进行分类研究是首要完成的任务，因此确定合理的分类标准是关键所在。

关于青铜刀的分类，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标准。一些学者依据刀体的形状进行分类。例如，李济按刀背和刀刃的形状，对殷墟出土的铜刀进行了分类。同时也敏锐地指出：“柄的分化，可以说是刀形器一步最重要的改革，启发了无限新形制产生的机会。”[①] 20 世纪 50 年代，陈梦家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刀进行了重新分析，也主要是按刀背和刀刃的形状进行分类，同时注重结合刀首的变化[②]。郑绍宗也按刀背和刀刃的形状对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刀进行了分类研究[③]。

①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 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 年。
② 陈梦家：《殷代铜器三篇》，《中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 年。
③ 郑绍宗：《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刀子及其有关问题》，《文物春秋》1994 年第 4 期。

另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青铜刀的文章中，按照刀柄或柄首的形状进行分类。如高本汉教授根据柄首的不同，将传出安阳的铜刀分成四类[①]；田广金、陈振中、李维明、刘一曼、陈亮等多数学者也都是根据刀柄或柄首的变化对铜刀进行分类研究[②]。

此外，罗越根据铜刀装饰纹饰的变化对铜刀进行分类研究[③]。

按照惯例，本书以甲、乙、丙等表示类别，以大写英文字母 A、B、C 等表示型别，形制特殊且数量较少的铜刀本书称为 Y 型。划分出亚类、亚型的则用小写英文字母 a、b、c 等表示，式别以罗马数字Ⅰ、Ⅱ、Ⅲ等表示（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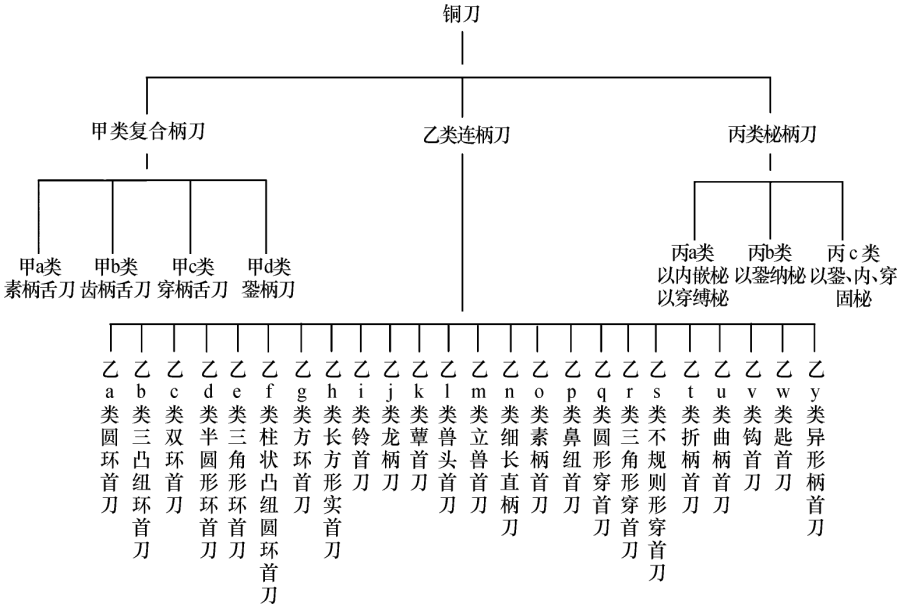

图 1-3 铜刀分类图解

① Bernhard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5, No. 17.

② a. 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和铜刀》，《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印，1981 年；b. 陈振中：《我国古代的青铜削刀》，《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4 期；c. 李维明：《简论商代青铜刀》，《中原文物》1988 年第 2 期；d. 刘一曼：《殷墟青铜刀》，《考古》1993 年第 2 期；e. 陈亮：《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削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3 年第 6 期。

③ Max Loehr.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New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Second Part: Knives, *Artibus Asiae*, 1951, Vol. 14, No. 1/2.

本书首先根据铜刀装柄方式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青铜刀以其刀身与刀柄结合方式的差异可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复合柄铜刀，即刀身部分为主体，柄舌扁薄短小，必须以木质、骨质等材料套接、铆接或夹装后方可使用。乙类为连柄铜刀，即刀身与刀柄一次性铸成，除有可能在刀柄上缠绳或包裹皮条之外，不再需要用其他材料对刀柄进行处理。丙类为刀背部有管銎或内和穿，需以銎贯柲或以内嵌柲、穿绳缚柲。

甲类刀根据柄舌的不同划分为 4 个亚类：甲 a 类，素柄舌；甲 b 类，齿柄舌；甲 c 类，穿柄舌；甲 d 类，短銎，可纳短木柄。

乙类刀依据柄部的差异划分为 24 个亚类：乙 a 类，圆环首刀；乙 b 类，三凸纽环首刀；乙 c 类，双环首刀；乙 d 类，半圆形环首刀；乙 e 类，三角形环首刀；乙 f 类，柱状凸纽圆环首刀；乙 g 类，方环首刀；乙 h 类，长方形实首刀；乙 i 类，铃首刀；乙 j 类，龙柄刀；乙 k 类，蕈首刀；乙 l 类，兽头首刀；乙 m 类，立兽首刀；乙 n 类，细长直柄刀；乙 o 类，素柄首刀；乙 p 类，鼻纽首刀；乙 q 类，圆形穿首刀；乙 r 类，三角形穿首刀；乙 s 类，不规则形穿首刀；乙 t 类，折柄首刀；乙 u 类，曲柄首刀；乙 v 类，钩首刀；乙 w 类，匙首刀；乙 y 类，异型柄首刀。

丙类刀根据固柲方式的不同划分为 3 个亚类：丙 a 类，以内和穿固柲；丙 b 类，以銎固柲；丙 c 类，综合以上两类之固柲方式。

各类青铜刀皆根据刀身的变化分型，形制特殊或不具备分型条件者统称异型（Y 型），以刀身整体或某些部位的渐变性特征作为式别标准。这种分类和型式划分方法基本上能反映出各类型铜刀出现时间的早晚、变化的过程以及区域差异。

第二章　夏代前后铜刀研究

有关夏代年代范围的研究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的阶段性成果将夏代的始年暂断为公元前2070年，而将夏商分界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意见。本书所说的夏代，大体就是指的这一年代范围[①]。在略早于夏代的齐家文化早期阶段[②]，已经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铜刀，且形态较进步。而在夏代之后的早商二里冈下层时期，出土铜刀数量不多，形式上也没有创新。因此本书将这三个阶段合并，定位为铜刀发展的初期阶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前1500年。

本章以考古出土的形态完整的夏代前后的铜刀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部分非发掘品和出土残器的形态，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与分期研究。理清铜刀的演变脉络，比较区域间铜刀形制的异同，进而观察各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一节　种类与型式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甲类复合柄铜刀和乙类连柄铜刀。

（一）甲类　复合柄铜刀

1. 甲a类　素柄舌

A型　刀体呈长条形，刀锋圆钝，柄舌短宽。可分二式。

Ⅰ式：背微凸，刃平直，柄舌与刀身无明显分界。标本青海省互助县总寨M5∶10[③]，长13.5厘米（图2-1，1）。

---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② 根据张忠培对齐家文化的研究结果，出土铜刀的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属于齐家文化第二期，年代约在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之后段范围内。参见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③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Ⅱ式：背平直，凸刃，柄舌与刀身分界较明显。标本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ⅢM2∶4[①]，长 18.4 厘米（图 2-1，2）。



1　　2

图 2-1　甲 a 类 A 型刀

1. Ⅰ式（互助总寨 M5∶10）　2. Ⅱ式（二里头ⅢM2∶4）

变化规律：柄舌与刀身分界由不明显变得明显，刀身由短变长。

B 型　刀身呈三角形，尖锋微翘，柄舌宽短。

标本青海省化隆县半主洼 88M2∶6[②]，长 8、宽 2.6 厘米（图 2-2，1）；标本二里头ⅨH13∶2[③]，长 8.8、最宽 2.2 厘米（图 2-2，2）。



1　　2

图 2-2　甲 a 类 B 型刀

1. 化隆半主洼 88M2∶6　2. 二里头ⅨH13∶2

C 型　刀身呈三角形，刀背平直，尖锋。可分二亚型。

Ca 型　宽柄舌。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短宽。标本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 T198⑦∶5[④]，刀锋残缺。残长 6.1 厘米（图 2-3，1）。

Ⅱ式：刀身窄长。标本河北省邯郸县涧沟遗址出土铜刀[⑤]，长 6.5 厘米（图 2-3，2）。

变化规律：刀身由短宽变窄长。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②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海化隆县半主洼卡约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 年第 8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2 期。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⑤ 德海等：《〈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更正》图一·5，《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图 2-3　甲 a 类 Ca 型刀

1. Ⅰ式（泗水尹家城 T198⑦:5）　2. Ⅱ式（邯郸涧沟遗址出土）

Cb 型　柄舌亦为三角形，铜刀整体形态呈倒置等边三角形。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短宽。标本泗水尹家城 79H5:2[①]，保存完整。长 5.6 厘米（图 2-4，1）。

Ⅱ式：刀身窄长。标本二里头Ⅳ T13②:33[②]，柄舌微上翘。长 6.6、宽 1.3 厘米（图 2-4，2）；标本河南省洛阳市东干沟遗址 H524:6[③]，刀背微凹。长 6.2 厘米（图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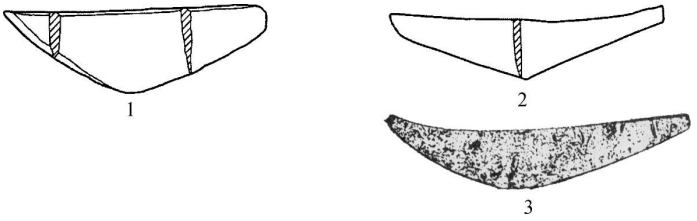

图 2-4　甲 a 类 Cb 型刀

1. Ⅰ式（泗水尹家城 79H5:2）　2、3. Ⅱ式（二里头Ⅳ T13②:33、东干沟 H524:6）

变化规律：刀身由短宽变窄长。

D 型　刀身呈三角形，柄舌扁长条状，与刀身分界明显。可分二亚型。

Da 型　刀身较短、较薄，柄舌短宽。可分二式。

Ⅰ式：刀背不平，柄舌短小。标本二里头Ⅳ T24⑥B:9，长 5.5、宽 1.6、柄舌长 1.2 厘米（图 2-5，1）。

Ⅱ式：刀身小，柄舌占比例较大。标本河南省郑州商城 C1T12②:4[④]，长 4.9、宽 1.3 厘米（图 2-5，2）。

变化规律：刀身形态逐渐规范。

---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 年。以后本书中提及的有关郑州商城的材料皆引自此报告，不再另行注释。

Db 型　刀身较长，直背，刀锋尖锐。标本山西省夏县东下冯 H38∶1[①]，柄舌残。残长 13.8 厘米（图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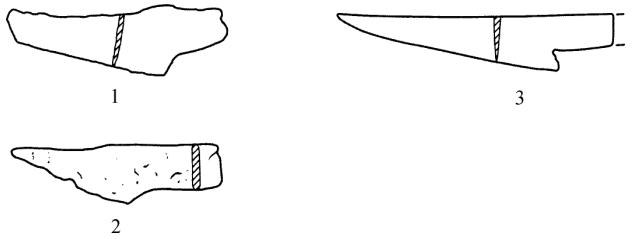

图 2-5　甲 a 类 D 型刀

1. Da 型Ⅰ式（二里头Ⅳ T24⑥B∶9）　2. Da 型Ⅱ式（郑州商城 C1T12②∶4）

3. Db 型（夏县东下冯 H38∶1）

E 型　长条形，背微凸，尖锋上翘，柄舌窄于刀身且较短。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略窄。标本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②]，刀锋微残，尺寸不明（图 2-6，1）；标本辽宁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 T2604④∶32[③]，背部呈水波纹状。长 15.5、宽 2.3 厘米（图 2-6，2）。

Ⅱ式：刀身略宽。标本新疆和硕县新塔拉遗址 79H· A∶1[④]，红铜质，柄舌端稍残，残长 16.2、中宽 3 厘米（图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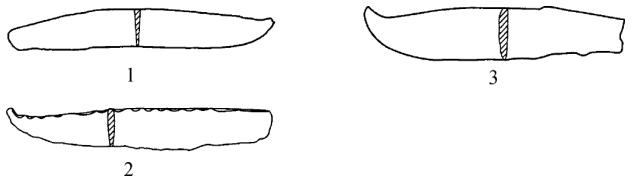

图 2-6　甲 a 类 E 型刀

1、2. Ⅰ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北票康家屯 T2604④∶32）

3. Ⅱ式（和硕新塔拉 79 H· A∶1）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②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六· 6，《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8 期。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和硕县新塔拉、曲惠原始文化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6 年第 1 期。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变宽。

F 型　长条形刀身，直刃，柄舌与刀身之间无明显界线。刀背上有两个片状突起，突起部分的长度不足 1 厘米，具体作用不明。可分三式。

Ⅰ式：标本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采集铜刀[①]，长 10.8、宽约 3 厘米（图 2-7，1）；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②]，柄舌残，尺寸不明（图 2-7，2）。

Ⅱ式：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T1322[③] 出土铜刀，尖锋上翘，长 15 厘米（图 2-7，3）。

Ⅲ式：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④]，保存完整，尺寸不明（图 2-7，4）。

变化规律：刀锋由圆钝逐渐变尖并逐渐上翘，刀身渐变窄长，形态逐渐规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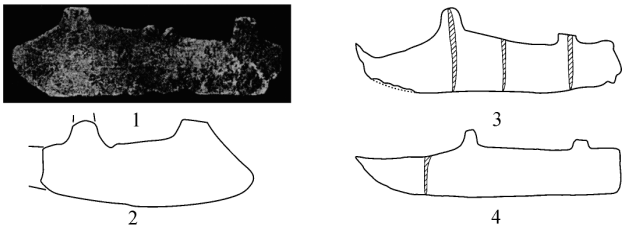

图 2-7　甲 a 类 F 型刀

1、2. Ⅰ式（武威皇娘娘台采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3. Ⅱ式（天山北路墓地 T1322 出土）　4. Ⅲ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G 型　刀身细长，直背，尖锋，柄舌窄于刀身。

标本二里头Ⅵ M57∶2[⑤]，柄舌上保留有朽木痕。长 34 厘米（图 2-8）。



图 2-8　甲 a 类 G 型刀

二里头Ⅵ M57∶2

H 型　细长条形状，尖锋，刀身与柄舌无明显界线。

①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②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五· 2，《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图一· 5，《文物》2001 年第 6 期。

④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七· 2，《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4 期。

标本泗水尹家城 T222⑦:45[①]，平背，刃微凸，长 5.3、宽 0.65 厘米（图 2-9，1）；标本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 T1:29[②]，长 6.7 厘米（图 2-9，2）。



图 2-9　甲 a 类 H 型刀

1. 泗水尹家城 T222⑦:45　2. 宁城榆树林子 T1:29

Y 型

标本武威皇娘娘台 F2 出土铜刀[③]，凹背，凸刃，刀身前端宽而平斜，柄舌由宽渐窄并上翘。长 11.5、宽 3 厘米（图 2-10，1）；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M694:2[④]，尖锋上翘，凸刃，柄舌较短，与刀身交接处形成束腰。长 7.5 厘米（图 2-10，2）；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⑤]，平背，刃微凸，刀锋较长并上扬，尺寸不明（图 2-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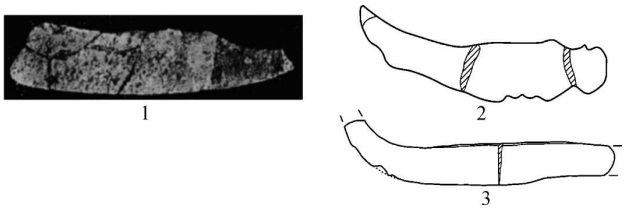

图 2-10　甲 a 类 Y 型刀

1. 武威皇娘娘台 F2 出土　2. 天山北路 M694:2　3.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2. 甲 c 类　穿柄舌

2 件，均出自哈密天山北路墓地。资料发表者认为这两件是镰，但这两件器物具有刀的特征，因此将其纳入本书研究范围。

---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12 期。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④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图一· 4，《文物》2001 年第 6 期。

⑤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五· 6，《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标本 1[①]，刀身细长，凸背，凹刃，刀锋微翘，柄舌端有圆形穿孔，尺寸不明（图 2-11，1）；标本 2[②]，刀身较宽，凸背，刃部平缓，弧锋，柄舌端有椭圆形穿孔，尺寸不明（图 2-11，2）。

这一时期未见甲 b 类齿柄舌铜刀和甲 d 类銎柄铜刀。



图 2-11　甲 c 类刀

1、2.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二）乙类　连柄铜刀

1. 乙 a 类　圆环首刀

A 型　刀背微凸，刃近平直，刀锋圆钝，刀柄两侧有凹槽。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较窄长。标本二里头ⅢM2∶3[③]，柄部微下曲，两侧饰平行凸斜线，其中间每面有 6 个凹槽，小环首。通长 26.2 厘米（图 2-12，1）；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④]（图 2-12，2）。

Ⅱ式：刀身短宽。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⑤]（图 2-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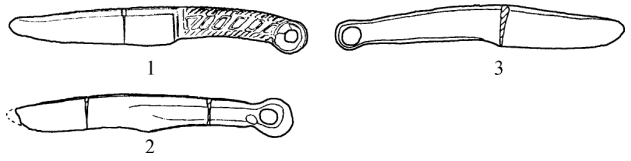

图 2-12　乙 a 类 A 型刀

1、2. Ⅰ式（二里头ⅢM2∶3、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3. Ⅱ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①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七· 5，《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②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八· 5，《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④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六· 1，《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⑤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七· 7，《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长变短宽。

B 型　刀身较直，刀背微凹，刀锋圆钝，刀柄两侧有凹槽。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较窄长。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①]（图 2-13，1）。

Ⅱ式：刀身短宽。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②]（图 2-13，2）。

变化规律：刀身由细长变略短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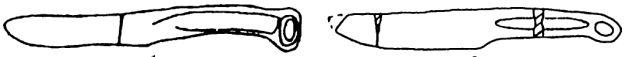

图 2-13　乙 a 类 B 型刀

1. Ⅰ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2. Ⅱ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C 型　刀身较直，尖锋，刀柄两侧凹槽延伸至刀身。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窄长。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③]（图 2-14，1）。

Ⅱ式：刀身短宽。标本甘肃省酒泉市干骨崖 M94∶5[④]（图 2-14，2）。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长变短宽。



图 2-14　乙 a 类 C 型刀

1. Ⅰ式（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2. Ⅱ式（酒泉干骨崖 M94∶5）

D 型　凸背，平刃，刀锋微翘。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较长，刀柄较短，刀锋微翘。标本甘肃省康乐县商罐地出土铜刀[⑤]（图 2-15，1）。

---

①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六·3，《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八·2，《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八·4，《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④ a. 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图一·1，《文物》2000 年第 3 期；b. 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图 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

⑤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二·18，《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Ⅱ式：刀身短，刀柄长而宽，刀锋上翘。标本酒泉干骨崖 M74:7[①]（图2-15，2）。

变化规律：刀身由长变短小，刀柄变长，刀锋逐渐上翘。



图2-15　乙a类D型刀

1. Ⅰ式（康乐商罐地出土）　2. Ⅱ式（酒泉干骨崖 M74:7）

E型　刀背与刀柄上缘形成上弧线，刀体呈弓形，刀锋圆钝。

标本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 H105:3[②]，刀柄两侧有凹槽，长15.9厘米（图2-16，1）；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M679:4[③]，长20厘米（图2-16，2）。



图2-16　乙a类E型刀

1. 昌平张营遗址 H105:3　2. 天山北路墓地 M679:4

F型　凹背，凸刃，刀锋圆钝上翘，环首不规整。

3件标本均出自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标本1[④]，刃部和刀锋稍残，柄部有穿孔（图2-17，1）；标本2[⑤]，刀身略宽胖，刀锋微翘（图2-17，2）；标本3[⑥]，刀身略窄长，环首微下垂（图2-17，3）。

G型　刀身形态修长，刀身与刀柄交接处有明显界限。可分二式。

---

① a.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三·3，《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b. 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图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 a.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图一·6，《文物》2001年第6期；b. 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图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④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六·7，《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⑤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七·9，《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⑥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七·7，《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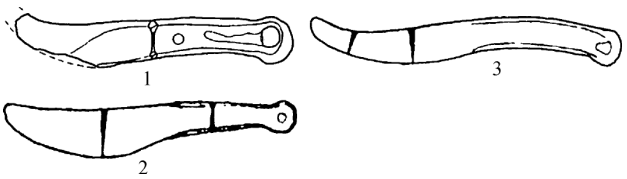

图 2-17　乙 a 类 F 型刀

1～3.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Ⅰ式：刀身平直，刀身与刀柄交接处有界格。标本四坝文化铜刀[①]（图2-18，1）。

Ⅱ式：刀身曲线优美，刀身与刀柄交界处有下阑。标本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 M1040∶3[②]，刀锋上翘，刀背微凹，刀柄微下垂，形成优美曲线。长 34.5 厘米（图 2-18，2）。

变化规律：刀身由平直变得有曲线，界格演化为下阑。



图 2-18　乙 a 类 G 型刀

1. Ⅰ式（四坝文化铜刀）　2. Ⅱ式（朱开沟 M1040∶3）

H 型　平背，凸刃，卷锋。

标本辽宁省阜新市西灰同城址出土铜刀[③]（图 2-19，1）；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④]（图 2-19，2），此标本虽柄部大部分缺失，但从残留部分可看出其柄部两侧有凹槽，结合已发表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刀以环首刀为主，且刀柄两侧均有凹槽的特点．推测此标本也极有可能是一件环首刀。



图 2-19　乙 a 类 H 型刀

1. 阜新西灰同城址出土　2.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① a. 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图一·3，《文物》2000 年第 3 期；b.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三·1，《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朝高速公路特刊》，2007 年。

④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七·12，《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Y 型

标本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刀[①]，刀身细长，平背，刃微凸，翘锋，刀柄饰折线纹（图 2-20，1）。

标本夏县东下冯 J2∶14[②]，刀身三角形，平背，斜刃，刀锋残，柄部有长条形镂孔，环首残。残长 12.2 厘米（图 2-20，2）。



图 2-20　乙 a 类 Y 型刀

1.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2. 东下冯 J2∶14

2. 乙 o 类　素柄首刀

这一阶段的素柄首铜刀形态各异，没有成熟的形式，在这里逐一介绍。

标本武威皇娘娘台 T17∶5[③]，刀身较宽，刀锋残，长条形扁柄。残长 18 厘米（图 2-21，1）。标本酒泉干骨崖 M74∶3[④]，刀身短小，凹背，凸刃，翘锋，刃部和刀锋有缺失，刀柄两侧有凹槽（图 2-21，2）。标本夏县东下冯 T1022∶4∶19[⑤]，保存完整，刀身窄长，刀锋尖锐上翘，长方形扁柄。长 12.3 厘米（图 2-21，3）。标本四坝文化出土铜刀[⑥]，凸背，呈弓形，刀身短小，刀柄较宽（图 2-21，4）。标本四坝文化出土铜刀[⑦]，凸背，呈弓形，刀身较长，刀柄窄长（图 2-21，5）。标本夏县东下冯 T4424∶3B∶17[⑧]，直背，凸刃，直柄，柄上满布细绳缠绕的痕迹。长 16.2 厘米（图 2-21，6）。标本天津市蓟县张家园 T2④出土铜刀[⑨]，刀身曲线明显，凹背，凸刃，柄首端下垂，形态呈 S 形。长 17.5 厘米（图 2-21，7）。

---

①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六· 11，《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图七· 8，《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③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

④ 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图一· 7，《文物》2000 年第 3 期；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图 6· 5，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⑥ 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图一· 8，《文物》2000 年第 3 期。

⑦ 李水城等：《四坝文化铜器研究》图一· 6，《文物》2000 年第 3 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⑨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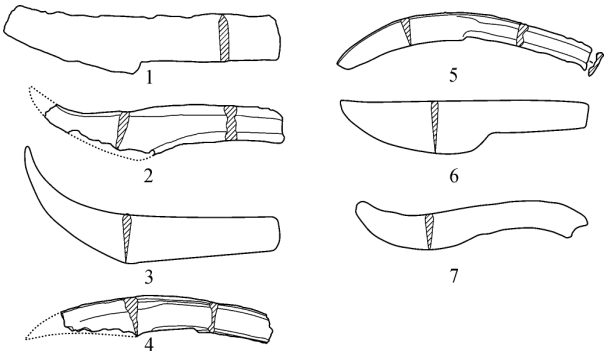

图 2-21　乙 o 类刀

1. 武威皇娘娘台 T17∶5　2. 干骨崖 M74∶3　3. 夏县东下冯 T1022∶4∶19
4、5. 四坝文化铜刀　6. 夏县东下冯 T4424∶3B∶17　7. 天津蓟县张家园 T2④出土

3. 乙 p 类　鼻纽首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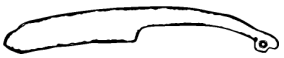

图 2-22　乙 p 类刀
岷县杏林遗址出土

仅 1 件。

标本甘肃省岷县杏林遗址出土铜刀[①]，凸背，刃略凹，刀锋圆钝，柄部向下弯弧，柄端下缘有一个圆形穿纽。长 22、宽 3、柄长 9.5 厘米（图 2-22）。

4. 乙 s 类　不规则形穿首刀

顾名思义，此类铜刀柄端有不规则形穿孔。共 2 件。

标本哈密天山北路 M307∶4[②]，刀身前段缺失，柄端有长条状不规则孔。残长 9.8 厘米（图 2-23，1）。标本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采集铜刀[③]，刀身宽肥，凸背，凸刃，刀锋宽弧，刀柄由宽渐窄，柄端有穿孔，已残。残长 10.8、刀身宽 1.7 厘米（图 2-23，2）。



图 2-23　乙 s 类刀

1. 天山北路 M307∶4　2. 库伦旗南泡子崖采集

①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 年第 11 期。

②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图一·1，《文物》2001 年第 6 期。

③ 郝维彬：《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96 年第 3 期。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前面已经对夏代前后铜刀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节的重点是对各类型的铜刀进行分期和断代。

本书将夏代前后铜刀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成二期。

（一）第一期

出土铜刀的主要地点和单位有：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 AT3、AT5、F2、T17、T18，临潭县磨沟墓地 M208[①]，岷县杏林遗址，康乐县商罐地遗址，玉门市火烧沟墓地；青海省互助县总寨 M5；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部分遗存；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 WT8H23[②]，荥阳市竖河遗址 H88[③]。

铜刀的主要类型有：甲 a 类素柄舌刀 A 型Ⅰ式，Da 型Ⅰ式，F 型Ⅰ式、Ⅱ式，Y 型；乙 a 类圆环首刀 D 型Ⅰ式，乙 o 类素柄首刀，乙 p 类鼻纽首刀。

齐家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2200 ~ 前 1800 年，其中武威皇娘娘台和互助总寨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早期阶段，其上限要早于夏代。岷县杏林和康乐商罐地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晚期阶段，相当于夏代早期[④]。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刀较多，进行过鉴定的就有 17 件[⑤]，由于发掘材料没有正式发表，无法进行具体研究。该墓地属于四坝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年代为公元前 2000 ~ 前 1800 年[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 ~ 前 1500 年[⑦]，在该墓地早期墓葬中出有甲 a 类 F 型刀[⑧]，该型刀也见于齐家文化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说明天山北路墓地部分墓葬年代很早。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3 件铜刀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登

---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 年第 7 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 年。

④ a.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 年第 1、2 期；b. 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⑤ 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 年第 7 期。

⑥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 年。

⑦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⑧ 吕恩国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图一五· 2，《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封王城岗和荥阳竖河遗址铜刀均出自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单位。鉴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 1900 ~ 前 1500 年[①]，所以我们推定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1900 ~ 前 1700 年。

综上所述，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之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200 ~ 前 1700 年（与本期铜刀共出的典型器物见图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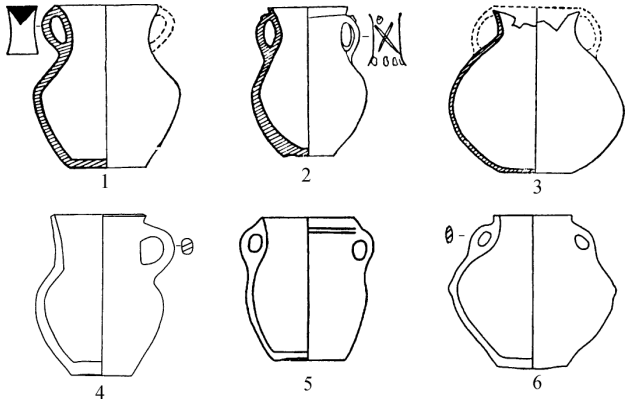

图 2-24　与夏代前后一期铜刀共出的典型器物

1 ~ 3、5、6. 双耳罐（1 ~ 3. 互助总寨 M5∶2、3、4；5、6.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4. 单耳罐（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二）第二期

出土铜刀的主要地点和单位有：甘肃省酒泉市干骨崖墓地；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部分遗存；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Ⅲ M2、Ⅸ H13、Ⅳ T13②、Ⅵ M57，偃师市高崖东台地 T6∶H13[②]，郑州商城 C1T12②，洛阳市东干沟遗址 H524、T506④[③]，新密市曲梁遗址 T4116⑥[④]；山西省夏县东下冯 T1022∶4、H38、J2、T4424∶3B，翼城县苇沟—北寿城遗址 DⅢ[⑤]；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 79H5、

① 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 年第 10 期。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洛阳考古实习队：《河南偃师伊河南岸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1964 年第 11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 1988 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 年。